

# 教育学家朱光潜

## ——关于朱光潜教育思想的系统阐述

文 / 郭勇健

长期以来,朱光潜的教育学成就遭到忽视。在某种意义上,朱光潜首先是个教育学家,然后才是美学家。他的学术之路始于教育学,他有大量的教育学论述,教育学是他的现实关怀的核心。朱光潜的教育思想,有完整体系,可以概括为一个宗旨、两道命题、三大问题、六组概念。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能够改造社会的领袖人物。两道命题即:就群体言,教育即风化;就个体言,教育即修养。他关注六个问题或六组概念:个人与社会、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理想与现实、动与静、身与心、情与理,其中三个问题较重要,这些问题遍涉德、智、体、美、群五个教育领域。

在谈论朱光潜先生的学术成就时,我们都赞成他是20世纪杰出的美学家,以他长达数十年的教学实践和学术著译,培养了好几代中国美学工作者,居功甚伟,有目共睹。然而,朱光潜不只是一个美学家,也不只是一个“教育家”,他还有一套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还是一个“教育学家”。美学家朱光潜,历来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而教育学家朱光潜,学术界却极少关注。在学术期刊上,偶有涉及朱光潜教育思想的几篇论文,都把论域限于朱光潜的“美育”和“文学教育”,这不啻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严格说来,还是将其教育思想附属于其美学思想,未能将朱光潜作为独立的教育学家来看待。美育固然是朱光潜教育思想的明显且重要的部分,却决非其全体。在美育思想的背后,朱光潜的众多著述中隐含着一般教育思想系统。不了解朱光潜的一般教育思想,也就不能充分地了解朱光潜的美育思想。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初步系统阐述朱光潜的教育思想,速写一幅“教育学家朱光潜”的形象,为朱光潜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也为教育学研究提供一份新材料。

### 一、朱光潜与教育学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朱光潜首先是个教育学家,然后才是美学家。由于我们长期为“美学家朱光潜”的先入之见所囿,将一枚“美学家”的标签牢牢地贴在朱光潜身上,因此说朱光潜首先是个教育学家这个判断,乍一看似乎是“欲标异见奇”,仔细端详之后即可发现,这不过是陈述了一桩简单的事实。我们至少能为这个判断提供三个切实的证据。

第一,朱光潜的学术之路始于教育学。朱光潜以“美学泰斗”、“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享誉于世,然而有意思的是,美学其实并不是他的“本行”或“专业”。在《文艺心理学》的“作者自白”中朱光潜说:“从前我决没有梦想到我有一天会走到美学的路上去。我前后在几个大学里做过十四年的学生,学过许

多不相干的功课,解剖过鲨鱼,制造过染色切片,读过建筑史,学过符号名学,用过熏烟鼓和电器反应表测验心理反应,可是我从来没有上过一次美学课。”<sup>[1]</sup>这段自白大体属实。但是严格地说,朱光潜还是上过美学课的。1929年入伦敦大学大学院之后,朱光潜也在巴黎大学注册,并“偶尔过海去听课”,听了巴黎大学文学学院院长德拉库瓦教授讲授的《艺术心理学》,正是在这门课的启发下,朱光潜起念写《文艺心理学》。艺术心理学当然属于美学。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也只能说朱光潜“旁听”过一次美学课,美学一开始只算朱光潜的“业余”爱好,三四十年代之后才成为他的兴趣中心。朱光潜的真正的“专业”乃是教育学。1918年至1923年,有五年之久(第一年进预科班补习英语),朱光潜在香港大学主修教育学。“在港大教育系,他学习的主要课程有英国语言和文学、教育学、生物学、心理学等等。从教育学这门课,他了解教育的本质、目的、任务和如何进行科学教育的方法等一系列教育理论。他还从英国19世纪哲学家兼教育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名著《教育论》里,认识到智育、德育、体育等方面全面发展及培养健全人格的重要意义。这些自然引起他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反思,对他以后从事教育事业,以及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等,都产生了不小影响。”<sup>[2]</sup>晚年朱光潜坦承,香港大学的学习“奠定了我一生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方向”(《作者自传》)。

第二,朱光潜有大量的教育学论述。尤其在其学术生涯的前期,朱光潜既从事教育工作,也从事教育学研究,写过不少教育学方面的论文。“香港大学是他接受正规专业的教育学训练的地方,在这里毕业不久,他就把专业训练形成的能力运用到中学教学实践中去。写了《在道尔顿制中怎样应用设计教学法》(1923)和《私人创校计划》(1924)等多篇论文,他一生总共写过教育学论文20来篇。”<sup>[3]</sup>其中《私人创校计划》、《说校风》、《谈美感教育》等,乃是朱光潜教育思想的代表作,下文将详加

解读。在20余篇教育学论文之外,朱光潜的一些专著其实也可以视为教育学方面的文献。1.成名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大体上是一部教育学的随笔集。作者俨然卢梭《爱弥儿》书中的那位教师,为青年提供生活和学习的细致指导;也正因为这本小书,朱光潜赢得了“青年导师”的称号。2.《谈美》是较纯粹的美学专著,但也未必与教育学完全无关。《谈美》又名“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延续了前十二封信的教育关怀。《谈美》开场白说:“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利禄等等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企求。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人心太坏”导致社会上充斥着种种“俗不可耐”的人物,因此朱光潜说,“在这封信里我只有一个很单纯的目的,就是研究如何‘免俗’。”<sup>[4]</sup>——“要求净化人心”、“研究如何免俗”云云,不单是美学的目的,也是教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这种美学和教育学的双重关怀,不仅在《谈美》中,也在《谈文学》中彰显出来。故而这两本小书,可以归类于广义的教育学。3.在朱光潜的全部著作中,《谈修养》最接近教育学,甚或可以直接看做教育学的著作。大而言之,在朱光潜看来,教育与修养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教育即修养。小而言之,朱光潜非常注重“群育”,而在《谈修养》中,有三篇“谈处群”、一篇“谈交友”。

第三,教育学是朱光潜的现实关怀的核心。朱光潜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决非“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高蹈避世的学者,而是一个关注社会积极用世的学者。他关注专门纯粹的学术问题,也关注人生问题、民族问题、国家问题、时代问题、社会问题,并且积极就这些问题发表看法。朱光潜甫一写作,就选择了较为通俗的大众读物写法,谋求象牙塔与十字街头的沟通、开辟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通道,这既是现实关怀的体现,也是启蒙意识的显示。朱光潜曾与立达学园的同人一起筹办开明书店,“开明”即“启蒙”。既云“启蒙”,则不能不关注教育。按照朱光潜的思路,人生问题、民族问题、国家问题、时代问题、社会问题,归根到底取决于教育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先要研究和解决教育问题,改革教育现状。因此,朱光潜一再强调:“教育是建国的根本工作。”“建国先须培养建国人,培养建国的人先须培养教师。”(《有志青年要做中小学教师》)“文化教育是国家命脉。”(《在四川大学总理纪念周上的讲演》)“中国要想廓清旧习积弊,恢复元气,能在世界上立得脚住,必定要组织好政府。好政府必建设在民主主义之上,所以要好人民才能实现。要想好人民,唯有从教育着手。”(《私人创校计划》)“治本的办法当然是改良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学校教育。”(《谈青年的心理病态》)总之,教育学是朱光潜的现实关怀的核心所在。

## 二、个人与社会

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

也。”诠释朱光潜的教育思想,也得“知人论世”。朱光潜的教育学论述,撰写于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在那半个世纪里,欧洲前后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中国则经历了义和拳运动、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五四运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等事件;战争、变动与混乱是时代的基本状况。乱世之中,百废待兴,人心惶惶,礼崩乐坏,世风日下。朱光潜忧心忡忡地指出:“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现在中国是一团混乱,谁也承认”(《在混乱中创秩序》)。处于这样的时代和环境之中,朱光潜所关切的主要问题就是:“中国社会如何可以变好呢?”他自己给出的答案是:“在混乱中创秩序”。如果人人都能奋发向上,努力征服环境改造社会,那么社会也将逐渐趋于合理有序。因此,“假如要把世界和国家扭转到正轨,必须个别分子的努力。”(《给苦闷的青年朋友们》)“社会越恶浊越需要有少数特立独行的人们去转移风气。”(《在混乱中创秩序》)

显然,正是由于现实问题逼迫而至,才产生了试图解决现实问题的朱光潜教育思想。在朱光潜看来,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能够改造社会、转移风气的“少数特立独行的人”,或曰“领袖人物”。这一思想在朱光潜为“立达学园”创校而写的教育独立自由宣言《私人创校计划》中阐述得最为清楚。该文论教育宗旨云:

最先我们应该有一个明了的目标,心目中早应打算造成何种人物出来。一般教育家有说教育是养成健全人格的,有说教育是预备生活的,有说教育是为国家造就公民的,都是太空洞,太模糊……我们的目标宁可失之偏,失之狭,但不能失之空泛,定要固定明了。……现在我们就问:目前我国最需要何种人物呢?社会想健全,各种人物,自政治家以至于贩夫走卒,都各有其效用。不过在混乱时代,尤其紧要的是改造社会的领袖人物。……我们如果想以教育改造社会,而又想收效迅速,必须先培养一班领袖人物,将来可以领着群众向光明处走。<sup>[5]</sup>

文中又说:“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唯一目的在养成改造社会的领袖人物。”

在《私人创校计划》中,朱光潜严厉批评此前的中国教育制度,如“班级制”。他说,在“班级制之下,聪明的学生和迟钝的学生都受同等待遇。因此聪明的不能充量地发展,迟钝的不能循序地发展。两相迁就,结果往往两相累误。”“在这个分工的世界,平均发展只能在一定限度以内,过此就要注意发展天才,培养特长。现行学制是完全没有顾及发展天才培养特长的。”这种旨在平均发展的班级制应当趁早废除,以“自学辅导主义”取而代之。在立达学园里,“资质中下或遗传根性不良者不收,因为我们目的在注重天才教育,为社会造领袖人物。”朱光潜认为,“领袖人物”必须“养成三种特长”:耶稣的舍己为群的精神;希腊斯多葛学者的简朴克欲的生活;近代科学所赋予的知识和方法。在后来的《谈理想的青年》中,朱光潜复又提出“四个条件”:运动选手的体格;科学家的头脑;宗教家的

热忱；艺术家的胸襟。“理想青年”无非是“领袖人物”的另一副面孔，而“四条件”亦可视为对“三特长”的补充说明。据此标准，领袖人物理应是天才人物、精英人物，特别是乱世中整顿乾坤收拾江山的英雄人物，因此，朱光潜的教育观也不妨称之为“英雄主义教育观”。后来他在另外的文章中补充道：“借自己的努力，艰苦卓绝地奋斗到底，以求征服一切环境困难，达到我们所追求的理想，这是我们所应崇奉的英雄主义。”（《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伦理观》）“英雄（或是叫他‘圣贤’、‘豪杰’）是学做人的好模型。所以从教育观点看，我们主张维持一般人所认为过时的英雄崇拜。”（《谈英雄崇拜》）

按照朱光潜的论述，教育的目标应当有两个：短期目标是培养领袖人物（天才、豪杰、英雄），长期目标是实现改造社会、转移风气。前者着眼于个体，后者着眼于社会；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朱光潜的教育思想，兼顾理想与现实、个体与群体，并且一上手就将他的教育理念置于“个人—社会”的结构之中。写就《私人创校计划》之后，朱光潜仍一如既往地强调道：“学校与社会绝缘，教育与生活绝缘，在学理上就不通。若谈事实，则这一代的青年，这一代的领袖，此时如果毫无准备，想将来理乱不问的书生一旦会变成措置咸宜的社会改造者，也是痴人妄想。”（《谈中学生与社会运动》）这种教育观，固然源于朱光潜对时代的观察、对现实的反思、对西方教育思想的吸收，其内里却流淌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血液。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来表达，教育的短期目标是“成己”，教育的长期目标是“成物”；前者着眼于“内圣”，后者着眼于“外王”。晚年朱光潜如此评价立达学园的《私人创校计划》：

这份宣言是在匡互生授意下由我执笔的，公开提出了教育独立自主的主张。叫做“立达”也有深意，来源于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两句话。“立”指脚跟站得稳，或立场坚定，“达”指通情达理，行得通。在“立”与“达”两方面，“人”与“己”有互相因依的关系，“成己”而后能“成物”，做到成物也才能真正地成己。这是“解放全人类才能真正地解放自己”这一深刻的辩证思想的朴素表达方式，我们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当然还茫然无知。<sup>[6]</sup>

据此，那种片面强调“养成健全人格”、“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之类的教育宗旨说，均只关注“成己”或“内圣”，令“成物”或“外王”付诸阙如，在朱光潜看来显然不够周全。自然，在朱光潜之前，也有兼顾个人与社会的教育宗旨说，如周恩来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蔡元培的“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然而，前者只是口号，后者只是教训，两者都不是教育理论，都不曾提供论证，都不如朱光潜的教育宗旨说意蕴深厚。

“个人—社会”结构的哲学表述，在中学传统大致是“成己—成物”或“内圣—外王”，在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中则为“部分—全体”这对范畴。一方面，全体大于部分，决定部分。另一方面，全体之所以为全体，就在于它是个有机体；全体若是有机体，必然“牵一发而动全身”，部分也会影响全体，改变全

体。部分与全体的关系如此，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亦然。个人是部分，社会是全体。朱光潜指出：“全体的紊乱固然可以妨碍局部的秩序，局部的紊乱也未见得可以造成全体的秩序。无论政论家怎么说，我始终相信全体的秩序要以局部的秩序为基础。”〔《给申报周刊的青年读者（二）——在混乱中创秩序》〕“我们要相信，中国各种社会事业之改进，其程序一定由下而上，由部分而全体，由凌乱而秩序，由人民而政府。单就教育说，我们少数人的热诚毅力决可以造就若干领袖人材。这若干领袖人材到社会去决可以做一番事业。”（《私人创校计划》）如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自然科学的首要问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哲学、伦理学、美学等人文科学共同关注的问题，而所有这些学科都与教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抓住“个人—社会”这个结构或这对矛盾，颇能收切中肯綮之功。

朱光潜有一篇伦理学的文章专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开门见山就说：“社会由个人集合而成，而个人亦必生存于社会。由前一点说，个人是主体，社会是扩充；由后一点说，社会是主体，个人是附庸。粗略地说，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偏重前一个看法，西方传统的伦理思想偏重后一个看法。”（《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伦理观》）这是一种颇为独特、甚至很成问题的观点。现今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西方文化的思想内核是“个体意识”<sup>[7]</sup>。事实上，诸如“养成健全人格”、“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等教育宗旨说，正是建立在西方文化的个体意识之上的，是自西方舶来的教育宗旨说。但朱光潜之所以如是说，可以理解为他是要为自己的教育观提供伦理学的支撑。据他看，伦理观的中西的差别，也是新旧的差别；西方社会本位的伦理观至现代更加显著，而中国外受西方的影响，也逐渐倾向于社会本位的看法。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社会是专制的，是压迫的，是不容自我伸张的。”（《谈十字街头》）社会本位之伦理观的末流，认定个人在时势和环境面前无能为力，无所作为，其极端形式即为定命论。朱光潜则提倡自由意志的伦理学，认定“心能转境”，呼吁青年们“自由伸张自我，不要泯没在十字街头的影子里去”（《谈十字街头》）。“自由意志”这一复合词，朱光潜不仅承认“自由”，尤其强调“意志”，主张“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推崇意志主义与英雄主义。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朱光潜反复强调：“我们必须承认人力可以改造社会，然后我们遇着环境的困难才不会绝望，而我们的努力也才有意义与价值，我们也才能够说：把这世界安排得较合理一点，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能够改造社会的，必是天才、英雄、领袖人物；而培养出天才、英雄、领袖人物，则是教育之事。“中国社会所以腐败，实由我们人的质料太差，学问、品格、才力，件件都经不起衡量。要把中国社会变好，第一须先把人的质料变好。”（《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伦理观》）“我们所缺乏的并不是人的数量，而是人的质料。如果没有先把人的质料变化过，其他一切且慢谈，谈亦等于空谈。变化人的质料正是教育的工作，也正是教师的工作。”（《有志青年

要做中小学教师)于是,朱光潜的教育思想,就完成了从个人到社会、又从社会到个人的循环。

发表于1924年的《私人创校计划》,是朱光潜的第一篇重要的教育论文,也是朱光潜全部教育思想的原点——是历史起点,也是逻辑起点。该文之于教育学家朱光潜,相当于《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之于作家鲁迅。《私人创校计划》初次呈现了朱光潜教育思想的纲领。纲举而后目张。朱光潜此后的许多教育随笔(或准教育随笔),大体上都是对《私人创校计划》之教育纲领的进一步精神充实、细节丰富和局部调整。这些充实、丰富和调整,仿佛水到渠成,使朱光潜的教育思想逐渐趋于细致化和系统化。其中较为重要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两个命题:1.从社会的一面说,“教育即风化”;2.从个人的一面说,“教育即修养”。

### 三、风化与修养

照朱光潜看,教育的长远目标是以领袖人物去改造社会,然而为了明日能够改造社会,今日在学校之内就必须先行过上社会生活或集体生活。这就是所谓“群育”。群育何以重要?这是由于中国的社会改造和民族复兴亟待民主政治的形成,而“民治就是群治,以不善处群的民族采用民治,必定是有躯壳而无生命,不会成功的。”(《谈处群——我们不善处群的病症》)在1902年至1906年发表的《新民说》中,梁启超已专列“论合群”、“论私德”各一节,谴责中国人“所最缺者”就是公德,“欲求合群,是何异磨砖以作镜,蒸沙以求饭也!”<sup>[8]</sup>深受梁启超影响的朱光潜,也痛感“不善处群”乃是中国人的“致命伤”,不吝篇幅分析我们不善处群的病症,探讨我们不善处群的原因。朱光潜认为,我们不善处群的原因,“历史环境居一半,教育修养也要居一半。”(《谈处群——我们不善处群的病因》)于是,他进而揭发过去学校“群育”的失败。“群育是吾国人向来缺乏的,现代学校教育对此亦毫无补救。”(《谈青年的心理病态》)我们在过去虽然也曾特标群育为教育主旨之一,试问一般学校里群育工作做到如何程度?“现行教育有一个大毛病,就是许多课程的对象都是个人而不是群体。”(《谈处群——处群的训练》)学校对于你们都没有尽到它应尽的职责。它只奉行公事,贩卖一点知识,没有顾到真正的学术研究,没有顾到校里的社会生活,更没有顾到人格熏陶。你们虽是处在一大群人之中,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寂寞的,与教师无往来,与同学往来也不多,终日独行踽踽,茫茫不知所之……”(《给苦闷的青年朋友们》)

为要对症下药,就必须提高群育质量,加强处群训练。把散在各处的吉光片羽归纳起来,朱光潜提供的方案主要有三:(一)设置特别宜于群体合作的课程,如音乐和体育。“音乐和运动是一个民族的生气的表现,不单是群育的必由之径。除非它们在课程中占重要位置,我们的教育不会有真正的改良。”(《谈处群——处群的训练》)(二)鼓励学生参加团体组织。1.但凡真的团体,必基于“共同意识”——共同理想、共同情感、

共同意志。参与团体生活,理智、情感、意志均投注其中,仿佛置身于一个大家庭,极易唤起公益心和集体荣誉感。2.不合群与无纪律相为表里。“大学教育要针对社会积弊,无纪律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大缺点。一个优良的大学必须养成尊重纪律的风气,为社会树立一个好榜样。”(《说校风》)团体既非乌合之众,亦非一盘散沙。但凡团体,必有纪律,方能维持。参与集体生活或社团生活,可养成遵守纪律、爱护纪律的德行。3.但凡团体,必有意见分歧、众声喧哗,因而参与团体生活还能培养辩论的兴趣和习惯。须知群育乃是民治之预习,而民治的精神即在“公事公议公决”,民主政治无非是“基于讨论的政治”,因此在《私人创校计划》中,朱光潜就规定立达学园的学员“每人每日至少有一小时的辩论或演讲”。辩论习惯于公于私均有极大好处:公可以体验民主精神,私可以相互切磋,推动学问长进。(三)良好“校风”的提倡。学校本身就是一个团体、一个完整的社会,但凡学校,必有校风。校风是群体造作、传统积淀而形成的结果。但是,有较好的校风,也有较差的校风。校风既有现成给定的一面,也有尚待形成的一面。为提高群育质量,必须积极营造一种良好的校风。良好的校风起于少数优秀分子的提倡。“校风是由一部分教师和同学提倡出来的。一个团体要好,不能马上都一齐好,必先有一部分人开风气之先,把这风气逐渐推广出去,使它风行。”(《说校风》)

在《说校风》一文中,朱光潜详细分析了“风”的五种意义——风格、风行、风气、风范、风化。正是在辨析“校风”概念时,朱光潜提出了“教育即风化”的观点:

我们每个人在一个社会里生活,都多少要受那社会的风俗习惯文物制度所影响,这就是说,为它所“风化”,凡是文化的建设与传播都赖这种“风化”作用。“文化”一词在西文为civilisation 动词则是civilize 字源是从拉丁文civis 来的,其意为公民或人群分子。所以“文化”就是“公民化”,或“人群化”,一个人对整个社会的风俗习惯文物制度所风化,就算是一个“被开化的人”(a civilized man)。就“风”的这第五个意义说,“风化”可以说与“教育”同义。从“风”和“风化”入手,博古通今的朱光潜还到中国传统教育思想资源中寻求支持。“中国讲教育最好的文章是《学记》,它谈到教育进步的程序有这几句话:‘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学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你看,除初入学只注重立足向外,以后几个阶段都看重群育。乐群、亲师、取友,都是着重同校里师生的关系。我国几千年来教育理想都特别看重尊师敬友,都是深见于在教育中人与人的关系之重要。这点精神是值得发扬光大的。”(《说校风》)但是,“风化”一词,应有两层涵义。在较低的层次上,风化指的是“群育”这一教育的特殊类别;在较高的层次上,风化指的是一切教育的理想性状或本质特征。“风化”两字,既可以笼统地说,亦可以分而言之。孔子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这是论政治,也是论教育。不

过孔子虽然以“风”喻教，却囿于小人与君子的等级关系，不免突出了单方面“顺从”的意味，因而这句话尚不足以作为“教育即风化”的佳例。陈之藩纪念胡适时说：“并不是我偏爱他，没有人不爱春风的，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的。”<sup>[9]</sup>这才是真正的“风”，这就是教育的理想境界或本质状态。孔子又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孔子家语·六本》）这是论交友，也是论教育。“化”字自然是点睛之笔。极端地说，好学生并非“教”出来的，而是“熏”（熏陶）出来、“化”（风化）出来的。因为“教”字颇有几分自上而下灌输知识之意，等而下之者，还有拔苗助长急功近利之嫌。而“化”字则化于无形，“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汉语有“教化”一词，又有“潜移默化”一说。教育在其本质上就是“教化”、“风化”、“感化”、“潜移默化”，终于“人文化成”。正是由于教育即风化，朱光潜才能把教育的长远目标定为“转移社会风气”。

就群体言，教育即风化；就个体言，教育即修养。风化是转移社会风气，修养是个体自我完善；前者侧重“移风易俗”，后者侧重“怡情养性”。但不论是风化还是修养，都是在“人格教育”的意义上加以阐发的。风化是人格的熏陶、人格的感化，修养是人格的修养、人格的淬炼。朱光潜有时将修养与教育作为同义词并列使用，有时直接用修养替换了教育。例如，“理想的教育应以发展全人为鹄的。全人包括身心两方面，修养也应同时顾到这两方面。心的修养包含智育德育美育三项，相当于知情意三种心理机能。身的修养即通常所谓体育。”（《谈体育》）又如，“天生的是资禀，造作的是修养；资禀是潜能，是种子；修养使潜能实现，使种子发芽成树，开花结实。资禀不是我们自己力量所能控制的，修养却全靠自家的努力。”（《资禀与修养》）这两段话里的“修养”，完全可与“教育”互换。人须教育方可成人，也就是须修养方可成人。教育是后天的造作，修养也是后天的造作。教育是使潜能实现，修养也是使潜能实现。“修养全靠自家的努力”，这可以理解为“一切教育都是自我教育”。人要不断地提高自我修养，这也就是美国哲学家格兰多在《自我教育》中所说的：“人的一生不是别的，实际上是一种继续教育，这种教育的结果就是使自己尽善尽美。”<sup>[10]</sup>使潜能充分实现、让自我不断完善的行为，传统儒家称之为“尽性”：

教育的功用就在顺应人类求知、想好、爱美的天性，使一个人在这三方面得到最大限度的调和的发展，以达到完美的生活。“教育”一词在西文为education，是从拉丁动词educare来的，原意是“抽出”，所谓“抽出”就是“启发”。教育的目的在“启发”人性中所固有的求知、想好、爱美的本能，使它们尽量生展。中国儒家的最高理想是“尽性”。他们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教育的目的可以说就是使人“尽性”，“发挥性之所固有”。（朱光潜《谈美感教育》）

所以，教育即修养，大体也就是“教育即尽性”。不过，儒

家的“尽性”含义较广，兼有“尽人之性”与“尽物之性”两义；既“成己”，也“成物”。朱光潜曾高度评价儒家的“尽性说”，他认为：“一切道德学说都不免肤浅，如果不从‘尽性’的基点出发。如果把‘尽性’两字懂得透彻，我以为生活目的在此，生活方法也在此。”（《谈动》）把朱光潜的“教育即修养”与“教育即风化”两个命题合并起来，几乎就是传统儒家“尽性说”教育观的现代阐释。

朱光潜何以特别强调教育的“修养”之义？这与他教育现状的不满有关。他发现，当时的教育已然沦落到把教育缩减为“智育”，简化为“贩卖知识”，从而把“人格教育”的精髓给遗忘了。“我们的根本错误在把教育狭义化到知识贩卖。学校的全部工作几限于上课应付考试。……从前人说读书能变化气质，于今人书读得越多，气质越硬顽不化，这种教育只能产生一些以些知识技能博衣饭碗的人，决不能培养领导社会的真才。”“要改良现状，我们必须把教育的重点由上课读书移到学习做人方面去，……教师也必须把过去的错误的观念和习惯完全改过，认定自己是在‘造人’，不只是在‘教书’。每个教师对于所负责造的人须当作一件艺术品看待，须求他对自己可以慰怀，对旁人也可以看得过去。”[《谈处群（下）——处群的训练》]因此，揭橥“教育即修养”的命题，有助于拨乱反正，将教育从“应试教育”的邪路重新拉回到“人格教育”的正道上来。朱光潜的这一思想，直到今天还没有失去其现实意义。

#### 四、问题与方法

某种思想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系统，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1. 蕴含有一个始终关注的中心问题；2. 运用了某种前后一贯的基本方法。例如笛卡尔哲学，本文的主要意图是重构或描述朱光潜的教育思想系统，为此，在揭示其逻辑起点和主要命题之后，还得进一步探究其问题与方法，以完成对朱光潜教育思想的系统阐释。

先说中心问题。朱光潜本人已提供了现成答案：“在写时我只随便闲谈，不曾想把它写成一部教科书，并没有预定的系统或中心思想。不过它不能说是完全没有系统。……问题自身有些联络，我的感想也随之有些联络。万变不离其宗，谈来谈去，都归结到做人的道理。”（《谈修养·自序》）这段话对朱光潜所有的教育学术论文和教育学随笔都是适用的。例如《谈美》的“前言”说其目的是“研究如何免俗”，其“结语”则归之于“人生的艺术化”。这既是谈美，也是谈人生，还是谈教育。教育学的基本原则，借用康德的命题，可表述为“人即目的”。因此教育学实即“成人之学”，它必须规划一种人的理想，作为教育的蓝图，并指示实现这一蓝图的手段和过程。易言之，教育学的要义，无非就是研究“做人的道理”。这正是可以将朱光潜视为教育学家的依据之一。

再说基本方法。我们在《文艺心理学》的“作者自白”中看到，朱光潜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经验心理学的归纳

法,一是“调和折衷”。前者得益于他的学术训练,后者植根于他的性格和信念。美学的方法也就是教育学的方法。首先,如前所述,朱光潜的教育思想发端于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在独立思考的过程中,自然也要参照古今中外的教育学资源,如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英国的卡莱尔、法国的卢梭、中国的孔子和孟子。但是,朱光潜并不是从某种既定的哲学体系出发,自上而下地推导出一套教育思想来,这与他的美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并无两样。其次,“人生是个有机体”(或“生命是个有机体”)是朱光潜毕生信奉行的基本原则,而有机体必是“多样统一”(或“对立统一”)的有机体。由于这个基本信念,也由于自身比较“中庸”性格,朱光潜的学术研究总不愿失之于偏,更不好走极端,喜欢调和折衷。“调和折衷”只是朱光潜的自谦说法,它在传统文化中的表述应为“执两用中”。例如,在人生观问题上,朱光潜拈出“看戏与演戏”这两种人生态度;在悲剧理论问题上,他偏好“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这组概念;在诗学中,他紧扣“情趣与意象”这个结构;在一般美学中,他坚持“美是主客观的统一”;……凡此种种,均为“执两用中”的表现,俨然“极高明而道中庸”。在教育中也是如此。

的确,通观朱光潜的教育思想,不难发现其中有着一以贯之的致思特点与研究方法:他往往先寻找某个教育问题的对立或矛盾的双方,而后谋求两者的统一,维持两者的平衡。他擅长发现对立或矛盾,而发现了对立或矛盾,通常意味着切入了解决问题的要害,但他更擅长使对立得到统一、使矛盾得到和解,从而,让问题获得较合理的解决。经过整理,朱光潜教育理论中最为关注的问题主要有:1.个人与社会;2.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3.理想与现实;4.动与静;5.身与心/生理与心理;6.情与理。这六个问题,也是六组概念。它们是围绕着朱光潜教育思想的中心问题即“做人”问题的问题簇。或者说,在朱光潜教育思想系统中,做人问题是第一级的问题,这六个问题则是第二级的问题。六个问题的重要程度不等,如“个人与社会”可谓相当重要,“动与静”则相对而言略为次要。“个人与社会”上面已经论述过了,篇幅所限,下面仅选择三个问题略加考察。

(一)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朱光潜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改造社会的领袖人物,领袖人物是正确价值的承担者,他们的使命是改正社会上错误的价值意识,影响社会的风气,引导社会的走向。总之,领袖人物应当是“通才”而非“专才”。目的决定手段,领袖人物应当接受“自由教育”而非“职业教育”。既然如此,朱光潜的教育计划必须分两步走:1.先指出专才教育或职业教育的流弊:“我并非反对职业教育,我却深深地感觉到职业教育应该有宽大自由教育做根底。倘若先没有多方面的宽大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做根底,则职业教育的流弊,在个人方面,常使生活单调乏味,在社会方面,常使文化肤浅偏狭。”(《谈升学与选课》)2.否定之后继之以肯定。朱光潜接着比较职业教育与自由教育的优劣,并推

荐自由教育或通才教育这条较少危险的康庄大道:“医工农商等等需要专才,而社会领导工作则需要通才。近代教育似正在徘徊于两种理想之间……依我个人想,自由教育对于社会领导工作实在比职业教育重要,不过这两种理想也并非绝对不能相容,专门的技术训练和普通的品格学识修养最好是并行不悖。”(《学业·职业·事业》)朱光潜曾以赞赏的口吻提到孔子“君子不器”的观点,“器”大体上就是现代的专业技术人员了。

尽管朱光潜承认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并非绝对不能相容”,可以“并行不悖”,如何实现这种统一,朱光潜是以“智育”为例加以说明的。事实上,“领袖人物”未必都是政治界的领袖人物,如孙中山,他们也可以是教育界、学术界的领袖人物,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包括朱光潜本人<sup>[11]</sup>。如前所述,领袖人物须养成“三特长”或满足“四条件”,“如果一个人具备了这四大条件,他就不愧为完人了。”(《谈理想的青年》)也就是一般教育著作中常说的“全人”或“完人”。因此政治界、宗教界、教育界、学术界各界的领袖人物,也都存在着“通”与“专”的问题。不过在学术领域或智育领域中,“通”与“专”的对立最为彰明较著。朱光潜处理这一对立的方式是,将智育或治学视为一个发展过程,将“通”与“专”作为发展过程的先后两个阶段,主张先“通”后“专”,先博而后精深,先博而后守约。《谈升学与选课》说:

我把生活看做人生第一桩要事,所以不赞成早谈专门;早谈专门便是早走狭路,而早走狭路的人对于生活不能见得面面俱到。

许多人一开口就谈专门(specialization)谈研究(research work)。他们说,欧美学问进步所以迅速,由于治学尚专门。原来不专则不精,固是自然之理,可是“专”也并非任何人所能说的。倘若基础树得不宽广,你就是“专”,也绝不能专到多远路。……学问这东西,先要能博大而后能精深。“博学守约”,真是至理名言。

《谈读书》一文也说:

世间绝没有一科孤立绝缘的学问。……不能通就不能专,不能博就不能约。先博而后守约,这是治任何学问所必守的程序。我们只看学术史,凡是在某一科学问上有大成就的人,都必定于许多其他科学问有深广的基础。

如此,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的矛盾,便通过辩证思维而得到解决。从智育回到一般教育的立场,朱光潜主张把职业学校与大学分开:“专门学校教育在培养专才,而大学教育则不仅在培养专才,而尤在培养通才,或则说,大学生应退可为专才,进可为通才。”(《说校风》)理想的大学生应当既能从事自己的专业,又能从事领导国家社会的工作。

(二)身与心/生理与心理。朱光潜是心理学家,写过《变态心理学》、《变态心理学派别》、《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等多部以心理学为名的专著,因此到了教育学领域,他也习惯于沿用心理学的眼光观察问题。在他的教育随笔中,与心理学

相关的文字多达二三十篇。但是,如同巴甫洛夫把科学的心理学建立在生理学之上,朱光潜也把心理学与生理学贯通起来,主张身与心不能分割。“健全的心灵寓于健全的身体。”——这是朱光潜常引的一句西谚。青年学生的心理问题最好先到身体去寻找原因,并争取通过身体的活动化解心理的病态。“生命是有机的,身与心虽可分别却不可割裂;没有身就没有心,身体不健全,心灵就不会健全。”(《谈体育》)“心理的毛病往往起于生理的毛病,生理的损耗必酿成心理的损耗。”(《谈青年的心理病态》)“人生来好动,好发展,好创造。能动,能发展,能创造,便是顺从自然,便能享受快乐,不动,不发展,不创造,便是摧残生机,便不免感到烦恼。”(《谈动》)因此,体育,包括运动、游戏、娱乐、消遣等,往往是解决心理问题的一剂良方。

然而,体育的主要作用只是锻炼身体,只能在一定限度内解决心理问题。心理问题毕竟复杂得多。除了身与心的冲突,还有心灵内部的冲突,欲调和后一类冲突,还得启用其他的教育方式,比如音乐教育。朱光潜援引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教育观点:一个人在二十岁以前,只消实施两种教育,即体操和音乐。“体操讲究好了,身体可以健全;音乐讲究好了,心灵可以和谐。身心两方面都达到理想的状态,还愁有什么学不好或是做不好?身心是基本,我们近代人舍基本不注意,只在一些肤浅的知识上做工夫,反自以为聪明。许多祸害似都由此起。”(《音乐与教育》)音乐之于教育,功莫大焉。柏拉图认为音乐能使心灵和谐。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可以将内心积郁和压抑宣泄出来,使心灵得到“净化”。孔子认为,音乐和诗歌能使人“温柔敦厚”,因而孔子“诗教”、“乐教”并重,并主张教育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古代儒生制礼作乐,既是政治活动,也是教育活动。照朱光潜看,音乐不只是美育,也是群育和德育的重要手段。于群育,它能化解个体与群体的冲突;于德育,它能调和心灵内部的冲突,例如情感与理性的冲突。

(三)情与理。内心冲突的诸多表现,首推情与理的冲突。自苏格拉底以来,欧洲传统哲学一贯认定“人是理性的动物”,以理性为人的本质,至于情感则是受理性支配统辖的对象。“不受激情控制”,历来是哲学家的主要标志之一。哲学家是一般人仿效的榜样。理想的生活就是遵循理性指导的生活。一旦情感与理性发生了冲突,应当让理性永远居于胜利的一方。中国传统哲学也有类似的看法。例如,冯友兰在评述庄子哲学时说:“感情可以通过理性和理解去化解,这是斯宾诺莎的观点,道家的观点也正是如此。”他把道家的观点简称为“以理化情”<sup>[12]</sup>。但是,19世纪末期以来,理性的权威受到根本的质疑。受生命哲学家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和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影响,朱光潜始终“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反对开历史的倒车,“尊理智抑情感”。在朱光潜看来,情感的力量比理性主义哲学家所想象的要大得多,它是不可能轻易就“化”掉的。与其说情感被一劳永逸地“化掉”了,不如说它只是暂时被“压抑”下去了。长久的和深度的压抑必将酿成更猛的心理冲突,更重的心理变态,

更大的心理危机。恰似大禹治水,情感只可疏导,不能堵塞,不能压抑,更不能摧残。“理想的教育不是摧残一部分天性而去培养另一部分天性,以致造成畸形的发展;理想的教育是让天性中所有的潜蓄力量都得尽量发挥,所有的本能都得平均调和发展,以造成一个全人。所谓‘全人’除体格强壮以外,心理方面真善美的需要必都得到满足。”理性要求得到充分的发展,情感也有同等的权利。要彻底解决情与理的冲突,不能靠“以理化情”,而应当仰仗审美教育,因为“美感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美感教育的功用就在怡情养性”(《谈美感教育》)。

朱光潜的美育思想,国内学者已有一些专题研究,此处不再赘述。需要提及的是,朱光潜并不把美育视为一种孤立的活 动,而是将它与德育连在一起。关于道德在人性中的根源,历来有两种说法,康德等理性主义者认为道德的依据在于理性,休谟等经验主义者(以及中国传统儒家)认为道德的依据在于情感。朱光潜照例调和折衷了这两种学说,把道德区分为“问理的道德”(morality according to principle)与“问心的道德”(morality according to heart)两类。“问理的道德”具有外在强制的性质,如康德的严厉的“道德律令”;“问心的道德”则起于内在的衷情,如休谟的“同情”(sympathy)孔子的“仁”。怡情养性,莫过于美育。据此,朱光潜认为美育与德育非但不相冲突,美育还是德育的基础。“德育并非陈腐条文的遵守,而是至性真情的流露。所以德育从根本做起,必须怡情养性。美感教育的功用就在怡情养性,所以是德育的基础工夫。严格地说,善与美不但相冲突,而且到了最高境界,根本是一回事,它们的必有条件同是和谐秩序。从伦理观点看,美是一种善;从美感观点看,善也是一种美。”(《谈美感教育》)

不过,“理”虽只有一字,却兼具理性和理智两种意义<sup>[13]</sup>,前者是道德的根源,后者是知识的根源。因此,在论述了美育与德育的关系之后,朱光潜本来还应接着论述美育与智育的关系,并论证美育也是智育的基础,如此才能圆满实现心灵的真善美的统一。遗憾的是,这一内容在朱光潜的教育思想中付诸阙如。实际上,朱光潜基本上仅在“理智”的意义上使用“理”字。而理智与情感是实实在在地冲突着的,未能真正地统一起来。若问朱光潜何以径直把美育等同于情感教育,那是由于他的美学观把艺术或诗视为“情趣与意象”的交融。既然如此,艺术的情趣如何为科学的理智奠定基础,美育如何为智育奠定基础,便成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避而不谈,实为明智。不过这个问题已经超出教育学,一脚踏进美学领域了,还是就此驻足为宜。

综上所述,本文对朱光潜教育思想的梳理和阐释,已然描绘出一个基本轮廓。朱光潜的教育思想体系,可以简述为:“一个宗旨,两道命题,三大问题,六组概念”。在此轮廓之内,朱光潜的思考遍涉德育、智育、美育、群育、体育五个方面,几乎穷尽了教育学的全部领域。朱光潜曾说:“教育必以发展全人为宗旨,德育、智育、美育、群育、体育五项应同时注重。”(《谈

# 朱光潜美学：在艺术与人生的交融地带

文 / 张泽鸿

朱光潜美学不是高高在上的形上学，而是着眼人间的人本美学。朱光潜的美学实践体现了两重经验：一是对古今中西美学资源的“六经注我”，以“美是主客观的统一”命题来统领；二是在审美主义与人生主义张力之间的斟酌取舍，以“宇宙人情化”和“人生艺术化”命题来显现。朱氏通过“艺术无道德的目的而发生道德影响”这一新说来统合艺术史上的“道德主义”与“唯美主义”两种不同主张，从而将意象直觉论与审美人生论统一起来。朱光潜的人本主义美学思想价值不仅已超越20世纪中国思想史而仍启迪着21世纪的中国美学新路径，并最终将进入未来世界美学的境域之中。

朱光潜先生(1897—1986)一生几乎与20世纪相始终，他60余年的学术生涯几乎是百年现代中国美学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他所构筑的博大精深、融贯中西的美学体系和谨严的学术方法对现代中国美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的主客统一的美学思想和人生艺术化的人文理念，已成为任何一个建构未来中国美学体系的探索者所必须重温的经典。从百年中国美学学术史看，朱光潜所代表的美学经验模式仍值得我们探寻和总结。从一定意义上说，朱光潜美学的价值不仅已超越20世纪中国思想史而直接启迪着21世纪的中国美学进路，而且他的思想还被西方美学界所关注<sup>[1]</sup>，走向世界美学的境域之中。

毋庸讳言，海内外学界从主体性(人学)维度来研究朱光

潜美学的成果相当可观，譬如：有的称其为“情感本体”论<sup>[2]</sup>，有的称其为“人学”美学<sup>[3]</sup>，有的称其为“人道主义”或“心体”价值论美学<sup>[4]</sup>，有的称其为“艺术心理学”(早期)<sup>[5]</sup>，有的称其为“艺术心性论”<sup>[6]</sup>，有的称其为“静穆美学”<sup>[7]</sup>，有的称其为“人生美学”<sup>[8]</sup>，不一而足。这对于我们考量和深入理解朱氏美学的总体风貌很有助益。朱光潜尽管是一个书斋型学者，但他并不固守于书本而不闻不问外在世事变迁，他对历次政治形势和社会风潮都是有所关注的，因此，从传统文化中吸取丰赡营养的朱光潜在对待西方文化和时代语境时，都能中西参酌，古今为用，灵活应付。他的美学不是高高在上的形上学，而是着眼人间的人本美学；他对西方美学的借鉴吸取，重视自我经验的科

青年的心理病态)朱光潜的教育学著述表明，他本人确实是“五项同时注重”的。“全人教育”、“全面发展”之类的话，已是当今教育界的流俗语或口头禅，但是，实实在在地把德、智、体、美、群这五大领域都走上一遍，在这五个方面都有所研究，有所发现，有所阐明，这样的教育学家应当说目前在中国尚不多见。事实上，一个真正能够研究全人教育、实施通才教育的学者，其本身也须是个通才。尽管朱光潜并没有写过教育学的鸿篇巨制，他的教育思想多属短论闲笔零星碎玉，但他的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全面发展的深厚修养足以弥补这一缺陷。毋庸置疑，美学家朱光潜也是一位货真价实的教育学家。

注释：

[1]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4页

[2]钱念孙.朱光潜：出世的精神与入世的事业.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14页

[3]王攸欣.朱光潜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15-16页

[4]朱光潜.谈美.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10-11页

[5][6]商金林.朱光潜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30页，42-43页

[7]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30-31页

[8]梁启超.新民说.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147页

[9]陈之藩.寂寞的画廊.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139页

[10]引自：小罗伯特·D·理查森.爱默生：充满激情的思想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144页

[11]王攸欣认为，王国维是“少有的天才学者”，而朱光潜“相对于王国维而言有其无法摆脱的禀赋方面的欠缺”。(王攸欣.选择·接受·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9.19页)从朱光潜的教育思想、美学成就和文学成就看，这个判断未必准确。依笔者小见，朱光潜本人想必正是以学界领袖、精英、天才自居的；当朱光潜主张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改造社会的领袖人物之时，大概正是他潜意识中的夫子自道或自我期许；当朱光潜强调做学问“先要能博大而后能精深”、“博学守约”之时，可能正是以自己为模特的。客观地说，朱光潜是一个通才，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也是一个“少有的天才学者”。

[1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96页

[13]可参看：梁漱溟.人心与人生.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83页

作者简介：郭勇健，博士，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编辑：豫民